



中国国民党

在台湾四十八年

甘观仕 萧效钦 陈乃宣 吴智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0 4389 4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八年

甘观仕 萧效钦 陈乃宣 吴智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12



国防大学 2 070 4389 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八年/甘观仕等著.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 12

ISBN 7-5000-6132-3

I. 中… II. 甘… III. ①台湾—概况—1949~ ②中国国民党—概况—1949~ IV. D67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9281 号

责任编辑:楼遂 胡人瑞

封面设计:童行侃

责任校对:殷华雷

责任印制:赵红征

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八年

甘观仕 萧放钦 陈乃宣 吴智棠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河北省固安县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1.875

字数:297 千字 印数:1—5000 册

定价:25.00 元

绪 论

我们几位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教学和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几年前曾主编和参编过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那是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本着实事求是原则编写的第一部反映中国国民党从诞生到败退台湾 50 余年概貌的史书。书出版后,香港的《天天日报》和北京的《瞭望》都发表了长篇的书评和报道,给予肯定。该书在安徽曾经被评为优秀图书一等奖。现在我们合著这本《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四十八年》,内容可说是前书的续篇,只是编写的体例有所不同罢了。

台湾问题是我们实现祖国统一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所有华夏子孙共同关心且举世瞩目的问题。现在编写这本书,用意正是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从政治历史层面加深对台湾近半个世纪来的演变的了解,以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一)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和祖国大陆有悠久的历史渊源。近百年特别是近 30 年来,在台湾陆续发现旧、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大量遗物,就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例如,据有关专家考证,距今 3 万~2 万年生活在台湾南部的古人类“左镇人”,同大陆的古人类有密切关系。以台湾西海岸中南部地区为中心的新石器时代的风鼻头文化,与大陆新石器文化在内涵和特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台东县卑南乡出土的石器、陶片和玉器,是二千年前台湾先民的遗物。这些先民在物质文化上与祖国南方各省的古越族十分相似,可确认为是古代“百

越”的分支之一。这些情况告诉人们,至少从遥远的3万~2万年前开始,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劳动、栖息和繁衍了。

从地理情况看来,台湾岛形成于第三纪(距今6500万年~248万年),曾经和大陆连成一片,后因地壳运动,部分陆地下陷,海水入侵,形成海峡和岛屿。但是,一水之隔,从来阻挡不了两岸人的来往。据一位参加发掘“长滨文化”(1968年在台县长滨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考古专家指出:“左镇人”时代台湾与祖国大陆还连在一起,“左镇人”可能是经长途跋涉,移至台湾的;较晚的“长滨文化”时期,大陆与台湾已被海水分隔,当时人们大概已懂得划船,故能从大陆渡海来台。在我国最早的史书典籍——《尚书》的《禹贡》篇中,写道:“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岛夷”可能指的是当时台湾的先民,文中意思是说那里的先民以麻织品为衣服,以贝类为饰物,使用竹器,当地盛产橘子、柚子,并向大陆的王朝统治者进贡。秦汉以后,史书关于台湾的记载更为具体。据《三国志》的《吴·孙权传》所述,公元230年,孙权曾派卫温、诸葛直两位将军率兵到过台湾。在吴人沈莹写的《临海水土志》中,台湾被称为“夷洲”。书中描述那个地方在临海郡(今浙江)的东南,相离有两千里,平地无霜雪,草木不枯,四面环山,土地肥沃,生长五谷,又多水产鱼肉。又据《隋书》记载,隋时称台湾为“流求”,隋炀帝曾经三次派人前往。第三次即公元610年是虎贲郎将陈稜、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军万余渡海到达台湾。唐朝以后,祖国东南沿海的百姓为逃避战乱而陆续有人移居澎湖和台湾。

元朝时,台湾名称的书面用语为“瑠求”。如《元史》所说:“瑠求”在南海之东,漳、泉、兴、福四州界内。澎湖诸岛与瑠求相对,素不相通,在天气晴朗之时,远望过去,隐约可见。14世纪中叶(一说13世纪末),元朝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隶属福建泉州同安县(今厦门),负责管理台湾和澎湖列岛的民政事务。明朝时,著名的

航海家——“三宝太监”郑和，于公元 1430~1433 年的最后一次航海途中，曾率舰队驶到台湾的台南一带躲避台风，并上岸取水，留下了历史足迹。公元 1563 年，明朝为了防御倭寇的侵袭，在澎湖设“巡检司”，加强军事部署。后又于天启年间，“筑城于澎湖，设游击一，把总二，统兵三千，筑炮台以守”，并在台湾的鸡笼（今基隆）、淡水两港驻屯军队。公元 1620 年，为了反抗明朝官府的欺压，福建海澄人颜思齐和泉州南安人郑芝龙率当地民众分乘 13 艘船移居台湾。他们从台岛中部的北港（今嘉义）上岸，构筑了 10 个城寨，以农耕或渔猎为生。后来的移民规模更大，对开发台湾岛的贡献更多。值得注意的是，明朝有关台湾的著述较之过去更加丰赡。见诸著述的台湾的名称有：“小琉球”、“大惠”、“东蕃”、“台员”、“大园”等，“台湾”一名也已出现。台湾岛内的一些地名，诸如鸡笼、打狗（今高雄）、淡水等，也可在这些著述中见到。那时台湾的地名和风俗习惯，深深地打上了闽南和粤东的烙印，可见来自祖国大陆，特别是闽粤的移民，已遍及全岛南北。

至于葡萄牙的船员发现台湾并把它称为“福摩萨”（美丽岛的意思），那是公元 1544 年（明嘉靖二十三年）的事。1604 年 8 月，荷兰人的舰队侵入澎湖屿。同年年底，明朝军队把它们赶走。1622 年 5 月，荷兰人再次占据澎湖，并修筑了城堡，但到 1624 年便被驱逐。这些荷兰人转而侵占了台湾岛的台南一带。1626 年 5 月，西班牙人占据台湾北部鸡笼、淡水等地。至 1642 年，荷兰人攻占了西班牙在台北的据点，于是，台湾沦为荷兰人独占的殖民地。荷兰殖民者在台湾横征暴敛，凶残掠夺。广大台湾同胞不甘屈辱，奋起反抗，斗争的烈火连绵不断。其中，1652 年 9 月由郭怀一领导的抗荷起义，参加的民众多达万余人。荷兰军队残酷地镇压了这次起义，郭怀一英勇战死，六千多名起义民众被屠杀。到了 1661 年 4 月 21 日，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大军二万五千人横渡海峡，来到台湾西部沿海，对荷军展开多次激战，终于迫使荷兰殖民者于

1662年2月1日签字投降,撤出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将台湾称为东都,改赤崁城为承天府,下辖二县,南部为万年县,北部为天兴县,号召大陆人民移居台湾,开发宝岛。在郑成功领导下,军民广开垦区,实行屯田,保护林木,发展贸易,兴办学堂,台湾的经济和文化得以迅速发展。这在台湾的开发史上谱写了重要篇章。公元1683年,清朝政府向台湾进军,郑克塽(郑成功之孙)率众投降。至此,台湾归于清朝政府的统一管辖之下。1885年,清政府在台湾建省,首任巡抚是抗法名将刘铭传。从此台湾成了中国的一个行省。

(二)

近代崛起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步荷兰、西班牙之后尘,垂涎于台湾宝岛。公元1894年,岁值甲午,日本帝国主义明火执仗,对我国大打出手。侵华日军于1895年3月占领澎湖。同年4月17日,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硬把美丽富饶的台湾、澎湖等地,从我们祖国的怀抱中抢了过去。

割台凶耗传出,举国同愤。当时在北京会试的举人康有为集18省考生千余人,联名上书清廷,反对割地求和,主张变法图强。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爱国学生运动。台湾同胞惊闻割台消息,更是同仇敌忾。人们夜以继日聚哭于市,并严正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于是,全岛义军揭竿纷起,与著名抗法英雄刘永福率领的驻台黑旗军紧密配合,展开了一场气壮山河的抗口保台战。他们自北而南,浴血奋战,节节顽强抵抗,“誓与土地共存亡”。但是,腐败的清政府竟死抱住卖国的方针不变,不惜切断大陆同胞对台胞的援助。爱国的台湾军民难以只手撑天,在死伤累累、弹尽粮绝的情势下,全岛沦陷。从此,日本帝国主义在台湾建立了殖民主义统治。但是,广大台胞的爱国热忱是任何力量所压制不了的,各种形式的反

压迫反奴役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抗日的斗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台湾岛内先后发生了反抗压迫的“北埔事件”、“林杞埔事件”、“土库事件”、“大湖事件”、“关帝庙事件”、“东势角事件”、“苗栗事件”、“六甲事件”、“西来庵事件”,以及震惊中外的雾社高山族暴动事件等。这一次又一次的或大或小、或分散或集中的暴力斗争,虽然都遭到了日本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但是烈士们的鲜血并没有白流。这些斗争激励着越来越多的台胞走向觉醒,决心抗日复台,回归祖国。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最先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他为了中华振兴和祖国统一,始终关注着台湾同胞的救亡斗争。他几次东渡日本均取道台北,而且派战友陈少白到台湾组织兴中会分会,派同盟会会员罗福星赴台建立同盟会台湾支部。罗于1914年壮烈牺牲,年仅29岁。遗有绝命诗一首:“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半生爱自由……弹丸如雨炮如雷,喇叭声声战鼓催,大好头颅谁取去,何须马革裹尸回。”此后,台湾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为团结台胞,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也进行了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斗争。

从思想文化战线来看,台湾在日本统治的整整半个世纪里,无论日本殖民者怎样竭尽全力,企图彻底摧毁中华文化,代之以“皇民文化”,台湾文化却始终汉魂永存。那时候,爱国台胞为保存祖国文化,采取各种方式,让子弟们学习汉文。20世纪20年代,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台湾也发起了白话文运动、新文学运动,并出现了乡土文学运动。在日本统治者一再下令废除私塾、禁习汉文的极端困难条件下,台湾的爱国者仍多方集资创办汉文杂志,开展诗社活动,出版小报,锲而不舍地致力于汉学的发扬和汉文化的传播。著名的史学家、诗人、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连横(字武公,号雅堂)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为了抒发家国之苦,期望郑成功之再世,教育后人不可数典忘祖,而不惜奔波劳碌,辛勤

笔耕,以几十年的心血,写成《台湾通史》、《台湾诗集》等鸿篇大著。在日人禁用汉文的险恶环境里,他创设雅堂书局,专卖中国图书和文具。“九一八”事变后,他又遣子回大陆工作。章太炎曾称赞他的《台湾通史》富有民族之精神,一定会流传后世,张其昀也称这部书的力量超过日本侵略者的“全部陆海空军”。以连横为杰出代表的台湾爱国文人,堪称在海峡彼岸捍卫中华文化的抗日英雄和斗士。

在“五四”爱国运动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影响下,台湾岛内自20年代至30年代,相继出现“台湾文化协会”,农民、工人的协会或联合会等组织。旅居大陆的台胞先后在北京、上海、广东、南京、厦门等地成立了青年会、学生联合会、革命青年团、反帝大同盟等组织。这些组织都是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建立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始终为台湾的光复和祖国的统一而奋斗。

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八年抗日战争中,海峡两岸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以血肉筑长城,驱寇自救,并在盟国配合下,赢得了战争的彻底胜利。1943年11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与蒋介石在开罗会谈的会谈纪要中明确指出,双方“一致同意,日本以武力夺取的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同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公布于世。其中规定:“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取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在波茨坦会议上,以中、美、英三国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了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以后苏联参加签字),重申《开罗宣言》的条款,规定“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之其他小岛之内”。同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1日,中国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

织大纲,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10月25日,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称中山堂)举行。日本投降代表、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向我国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将军呈投降书。会后,陈仪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告:自即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主权之下。次日,台北市学生及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台湾的光复。台湾全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欢歌畅饮,通宵达旦。1946年1月13日,中国政府正式通告:“台湾人民(包括汉族及土著之高山族)原系我国国民……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应即一律恢复我国籍。”并确定这一天为台湾光复节。日本在台湾长达50年的殖民统治结束了。这是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海峡两岸中国人民长期斗争的共同胜利,也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胜利。

(三)

众所周知,近半个世纪以来,台湾同祖国大陆的人为分离,是国共两党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在这近50年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华民族利益的忠诚代表者,自觉地把统一祖国和振兴中华的历史重任担当起来,不断寻求解决台湾问题的适当途径,终于确立了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本来,台湾问题的解决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国势力插手和干涉。但是,某些外国反华势力,不愿意中国实现统一,极力加以阻挠,使台湾问题的解决面临着某种复杂的国际因素。尤其是美国,一直念念不忘要把台湾变为它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进行侵略扩张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海军准将佩里就受命带领两艘军舰巡航台湾。他返国后,即建议美国政

府占领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台湾光复,重归中国版图。但是,美国政府却炮制“台湾地位未定”论,设想出几种方案,妄图控制台湾:①将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②在台湾扶植一个亲美政权;③扶持“台独”;④美国自己占领台湾。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美两国建交后,情况才有所改变。美、日两国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实际行动上美国仍继续阻挠中国的统一。台湾问题至今仍是中美关系中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维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一切干涉中国内政、插手台湾问题的外国势力进行坚决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同时,又审时度势,及时调整对台政策,不断促使海峡两岸形势向有利于祖国和平统一的方向发展。

早在 50 年代初期,在抗美援朝战争取得历史性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就考虑把“武力解放台湾”的方针改为“和平解放台湾”的方针,希望通过建立第三次国共合作,来实现两岸的和平统一。1955 年 5 月 13 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① 1956 年毛泽东提出“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的方针。同年 9 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② 1958 年 10 月,由毛泽东亲笔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提出了国共两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在此之前,毛泽东曾请与国

① 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 年 1 月版,第 1194 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 年 12 月版,第 255 页。

共两党的高层领导均有私谊的章士钊写信给蒋介石。章的信中有“奉化之蕙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台澎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之句。毛泽东特别赞赏这几句，但认为把台湾看作“南天”不恰当，建议改为“南云”。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根连到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会挖掉。台湾当局收到章士钊的信后，拒绝了美国政府要求国民党军队撤离金门、马祖，制造“一中一台”的图谋。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杜聿明等11人时，曾让杜聿明传话给台湾当局：“海峡两岸人民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是一家人。”“希望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反对美帝国主义。”在此前后，国共两方都曾派人与对方进行秘密接触。

60年代初，为了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多次指示，正式提出中共新的对台政策，并把它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即台湾必须统一于中国。“四目”为：①台湾统一于中国后，除外交事务必须由中央负责之外，台湾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均委于蒋介石；②台湾军政及经济建设一切费用不足之数，全部由中央政府支付（当时台湾每年财政赤字约8亿美元，毛泽东说过由中央政府给）；③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须等条件成熟时，尊重蒋介石的意见，经协商决定后才进行；④双方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的事。但是，蒋介石拒绝“一纲四目”的方针，拒绝中共一再表达的和谈诚意。

从70年代末以来，在新的形势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不再提“解放台湾”的口号，进而确立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这个全新的对台基本方针和有关政策。1978年下半年，中美进行了建交谈判，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开始考虑大陆与台湾统一后，台湾实行何种制度这个重大问题。

他在1978年秋至次年初会见日本、美国等国客人时,初步提出了关于“一国两制”的一些设想。他表示,大陆和台湾统一后,中央政府将尊重台湾的现实。首先它的社会制度不变,它的生活方式不变;其次,美国、日本等国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他接着指出,中央对香港问题、澳门问题的政策也是如此。1981年国庆前夕,叶剑英委员长就台湾问题发表了九条声明,即著名的“叶九条”。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一位海外朋友时又说:“九条”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概念。1983年6月,邓小平进一步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政策,即:“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①这就是著名的“邓六条”,它集中体现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邓小平在以后的多次谈话中,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构想。这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宣告正式确立。在这个方针指引下,两岸关系发展迅速,开创了新局面。

1995年1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对台湾发表了《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其要点是:①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和前提;②对于台湾同外国发展民间性经济文化关系,我们不持异议;③进行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谈判;④努力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⑤大力发展两岸经济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0页。

交流与合作；⑥中华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民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⑦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的生活方式和当家作主的愿望，保护台湾同胞的一切正当权益；⑧我们欢迎台湾当局的领导人以适当身份前来访问，我们也愿意接受台湾方面的邀请前往台湾，可以共商国是，也可以先就某些问题交换意见。上述八项主张，受到包括广大台胞在内的海内外爱国同胞和人士的热烈欢迎。它坚持并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所确立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经过 1997 年 9 月举行的中共十五大的批准，具有更高的权威性，是现阶段中共对台工作的基本纲领，也是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实现祖国统一的基本方略。1997 年 10 月，江泽民访问美国，取得巨大的成功。经过中美首脑会谈，美国总统克林顿重申中美双方曾经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表示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赞成搞“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当局加入联合国。差不多与此同时，中国总理李鹏访问日本，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也明确表示要以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为前提，来处理同台湾的关系。不足的是，日方尚未澄清所谓“防御范围包括台湾海峡”的错误说法。通过对美、日两国的高层访问，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这个原则，再次得到国际社会的确认。

上述情况说明，中共第一、二、三代领导集体所提出的对台工作方针，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而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其核心和共同点是始终坚持一个中国和祖国必须统一的原则；它充分反映了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

(四)

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和实践意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对于台、港、澳都是适用的,所不同的是台湾问题的解决纯属中国的内政。

首先,“一国两制”的构想是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一个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相结合的重要产物。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是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香港问题,用什么方式才能解决台湾问题。只能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和平方式,一种是非和平方式。而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到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邓小平“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正是三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从哲学思想看,它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统一,事物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统一,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光辉。

其次,“一国两制”的构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列宁关于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的思想原则。按照既往传统的理论和模式,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实行的只能是一种社会制度。“一国两制”的构想突破了“一国一制”的固有模式。在一个国家之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和谐共存,“谁也不吃掉谁”,既达到国家统一,又有利于不同地区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这是用和平共处的方法化解矛盾的新观点。本来,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思想是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把它转用于一国内部,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无疑是对列宁和平共处原则的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在一国之内两种制度共存,相互信任,互不干预,保持各自的发展。“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制度可以不同,但是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主体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只能在台、港、澳特别行政区实行。如果离开这个前提,“两制”就失去它存在的依据和意义。所以,“一国两制”就是在人民民主

专政的政权占主体地位的同时,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的地区统一在一个国家实体内,互利互补,共同繁荣和发展,求得整个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这一伟大创举,既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又为当代解决一国国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方式。

总之,“一国两制”的构想继承并大大发展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的新贡献、新发展、是解决当代国际、国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新思路,也是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重要内涵和标志。“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最可行、最有效的办法和途径,是我们坚定不移的一项基本国策。

江泽民指出:“实行‘一国两制’,有利于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因而“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和回归后的稳定和繁荣,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其一,“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将起巨大的示范作用和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了香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权力,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持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这就证明,海峡两岸统一后,台湾同胞现有的一切权益仍将继续得到维护,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不会被改变。从对外关系看,中央政府授权香港特区自行处理的对外事务所涉及的范围很广。台湾同胞可以从中得到启示:按“一国两制”实现统一后,他们才能真正与祖国大陆同胞和香港同胞一道,共享伟大祖国在国际上的尊严和荣誉。从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关系看,“一国两制”方针的落实,开创了香港与内地相互协作、共同发

展的新纪元,香港将继续保持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不变。同样,海峡两岸按“一国两制”实现统一,两岸产业可以更好地分工合作,台湾可以更好地利用祖国大陆的丰富资源、众多人才和广阔市场来发展经济。这一切说明,有了“一国两制”的香港模式,广大爱国台胞就有了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他们可以通过理智的比较,逐步消除对“一国两制”的疑虑,从而增加认同的心理。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可抗御的。

其二,香港的回归,为台湾问题的解决进一步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如前所述,台湾问题本是我国的内政,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干涉。但是,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反华势力,竭力插手台湾问题,使祖国统一大业面对复杂的国际因素。因此,台湾问题最终和平解决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要积极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香港的回归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成功实践,影响重大。因为:①百年国耻,一朝洗雪,香港同胞彻底摆脱了饱受外国殖民主义统治的屈辱地位,这标志着中国的繁荣强盛,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②香港在国际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香港回归后,中国的综合国力将明显增强,加上国内政局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健康地发展,从而将对全方位地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活动更为有利。③许多国家从香港回归中看到中国的崛起和强大,出于各自在香港和在中国大陆的经济利益的考虑,愿意寻求与中国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因而必将调整对华政策,其中当然包括对台湾问题的态度,这就使台湾当局在国际上处于更加孤立的境地。南非宣布与台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就是典型一例。南非与台北有几十年深交,是台湾当局迄今尚存的 20 多个“邦交”国中影响最大的国家。它在外交上的转向,是明智的抉择。世界舆论一致认为,这对台湾当局的“务实外交”是一次沉重打击,并可能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连台湾当局的要员章孝严也不得不承认,那些与台湾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每一个都